

民国银行家的生活样态与人际网络

——以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为例

高红霞 张克令

摘要 徐新六是民国时期参与了不少重要社会活动的银行家，同时也是活跃于政界、知识界、金融界和实业界的社会活动家。研究和梳理其书信及相关日记、家谱以及《申报》中记载资料，构建起徐新六人际网络的大致框架，从而考察他的人际网络在其一生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徐新六的人际网络，也可考察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圈的生存样态。

关键词 徐新六 银行家 人际网络

作者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10）；张克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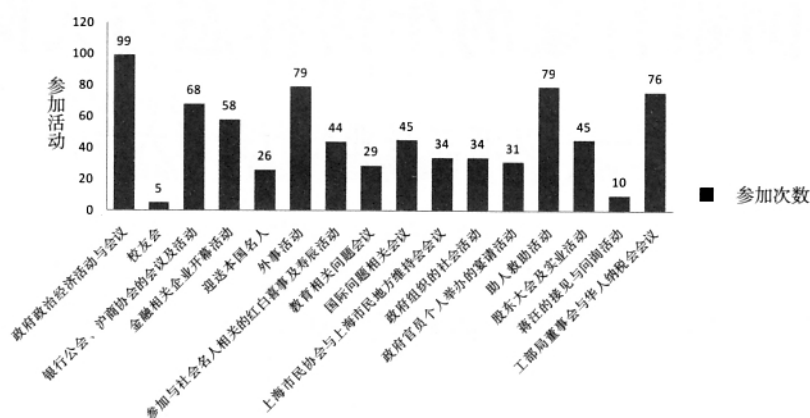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2-0139-16

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民国时期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有“银行界圣人”“学者银行家”等称号。作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也曾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1936年受宋子文聘任为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多次参与政府有关经济问题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多重社会兼职，这些兼职关涉教育、实业、政治、外交等多个方面。因此也建立起繁复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样的人际网络，使得徐新六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与他同时代的金融界人士胡笔江、陈光甫、钱新之等。本文选择徐新六的人际网络入手，探讨中国近代金融业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人际网络及其对人物性格形成、事业成功所产生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往往贯穿在人物的公私领域，渗透于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人物的政治立场、人生轨迹和生活态度。徐新六有着庞大的交际圈，通过对徐新六人际网络的考察，可从一个侧面认识民国金融界人物的职业理念、政治立场、生存态度，在民国的社会舞台上，人际网络是如何影响职业仕途和社会地位和声望，以此窥测近代中国金融人物的生存样态。

一、徐新六的社会交往与活动

从1908年徐新六被公费派送到欧洲留学至1938年去世的三十多年之中，由于他的身份地位，他所参加的活动几乎都会上报，徐新六的名字无数次地登上《申报》，因此《申报》上所记载的活动是考察徐新六社会活动的有效依据。笔者整理和考察了《申报》中与徐新六同时参与社会活动的国内人士的详细名单和身份职业，以及他们与徐新六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可以就这些活动做州分类考察，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别：

图 1 参加活动概述图



1. 工部局董事会与华人纳税会会议（76 次）；2. 政府政治经济活动与会议（99 次）；3. 校友会（5 次）；4. 银行公会、沪商协会的会议及活动（68 次）；5. 金融相关企业开幕活动（58 次）；6. 迎送本国名人（26 次）；7. 外事活动（79 次）；8. 参加与社会名人相关的红白喜事及寿辰活动（44 次）；9. 教育相关问题会议（29 次）；10. 国际问题相关会议（45 次）；11. 上海市民协会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议（34 次）；12. 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34 次）；13. 政府官员个人举办的宴请活动（31 次）；14. 助人救济活动（79 次）；15. 股东大会及实业活动（45 次）；16. 蒋汪的接见与问询活动（10 次）。下面笔者将用一些事例来阐述上述的分类。

1. 工部局董事会与华人纳税会会议：“工部局副总巡姚曾漠于昨日上午十时在戈登路巡捕房函邀纳税会正副主席虞洽卿冯少山，华董贝淞荪、袁履登、赵晋卿、华委员李馥荪、林康侯、钱龙章、徐新六、陈霆锐、秦润卿等检阅华捕。直至十二时始行毕事”。徐新六 1927 年年底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先后担任华人纳税会委员和工部局华董，在这里面他经常接触的外国同事都是公共租界的重要人物，而华人方面，都是当时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头面人物，例如袁履登这种当时的海上闻人。同时由于公共租界在当时上海的重要性，徐新六也得以接触更多的外国人士，而国民政府因为徐新六的这层身份，在外事活动中也会更加看重徐新六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2. 政府政治经济活动与会议：“中央造币厂新币审委会昨成立……昨日到会之委员：计有孔祥熙、卢学溥、陈行、席德愈、胡孟嘉、叶琢堂、唐寿民、胡笔江、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徐寄顾、徐新六、陈光甫、谢韬甫、秦润卿、吴蕴斋、叶扶霄、胡摘庄、简东浦、郝枢民、雷生勃、马肃、林枢、马锡尔、台维、赖爱司米纳·史比门、耿爱德、麦凯、施璜·史比门、戴景福等三十四人，除贝淞荪现在美国外，徐堪、张公权两委员则因事请假未到”。徐新六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银行家，以他个人的学识和能力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倚重，他参加 1935 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并在其中有大量的献计献策。通过这种活动，徐新六可以接触到当时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内最精英层面的人士，同时也可以和国外的专家学者交流，增长个人的见识。

3. 校友会：“本埠南洋公学同学会选举理事已识。前报未满期之理事为章伯初、黄任之、凌竹铭、林康侯、张叔良、王寅清六人。此届选举以浙江兴业银行总理徐新六、新通贸易公司工程师张延祥、及母校教职员徐君陶、沈叔遴、张松亭五人票数最多当选。昨已分别通知矣。除徐新六君外，余四人均选举连任”。徐新六本人一生在国内外都接受过教育，他的学缘人脉也是极为丰富。这类活动是人们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给徐新六建立与稳固人脉提供了一种可能。“前日（十日）下午四时德奥瑞同学会唐宝书、黄伯樵、沈怡诸君在江湾唐园招待据龙舰将佐，到舰长以次军官练习生二三十人；德宾到者有代理总领事白仁德夫妇、海军提督金遂尔、德国商会富凯尔等三十余人，华宾则有黄乃枢、马君武、徐新六等四十余人”。

4. 银行公会、沪商协会的会议及活动：“银行业公会昨开第七届会员常会，出席各会员银行代表计有中国银行张公权、贝淞荪、经润石；交通银行唐寿民；大陆银行叶扶霄；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徐寄扇、徐新六；新华银行王志萃；绸业银行王延松、骆清华；金城银行吴蕴斋；盐业银行陈蔗青；江苏银行许伯明；东莱银行吴蔚如；中南银行胡笔江；垦业银行王伯元等六十四人；由主席委员陈光甫主席、顾诚安记录。”徐新六作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理事和总经理，而浙兴曾经一度是“南三行”中的“领头羊”，这样的身份地位使其在银行

业内话语权十足，同时，浙兴又支持实业。这就使徐新六的交际圈扩展到当时沪上的银行界与商界的大人物。

5. 金融相关企业开幕活动：“浙江地方银行昨开幕，由董事长朱孔阳启匙后，全体行员鱼贯而入，董事叶瑜、陈行、金伯顺、总经理徐恩培均到行招待来宾。到者有宋汉章、贝淞荪、钱永铭、陈光甫、徐新六、秦润卿、虞洽卿、唐熙、宋子文、杜月笙、张啸林、俞飞鹏等”。徐新六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决定了上海当时与金融业相关的企业和银行举行活动时，徐新六都是被邀的座上宾，这是徐新六影响力被肯定的一种体现，从同他一起被邀的人士也可以看出徐新六的地位层次。

6. 迎送本国名人：“出席太平洋学会事竣，胡适返国昨抵沪，今晚七时半在青年会公开演讲，友好欢迎，轮泊公和祥码头前往欢迎者计有市府科长李大超、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周压、国劳局中国分局长程海峰、江海关监督诸昌年、银行公会徐新六、中国红十字会颜福庆、航空协会姚锡口、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刘驭万、交大校长黎照寰、立委简又文，暨薛笃弼等数十人”。当时民国上海有大人物来时，徐新六都会被安排或主动接送。这其中文化界的胡适、演艺界的梅兰芳、外交界的顾维钧等等，都是在当时享誉国内的人士。由于他的影响力，使他有可能结交其他领域内的翘楚，而与他同去的人中，也都是上海滩的各个领域中的大人物。

7. 外事活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及夫人马凤岐女士昨日下午一时在市政府大礼堂欢宴美国副总统迎纳、众议院议长贝恩及国会议员代表团，并邀本埠中外各界作陪。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余铭、郑莱、董显光、郭德华、徐新六、虞洽卿、贝淞荪、杜月笙、王晓籁、郭秉文、马荫良、李才、钱沧石、梁士纯、许建屏、杨光生、汤良礼、温万庆，及市府各局长秘书等共二百余人”。徐新六工部局华董的身份，再加上他又是当时国内金融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同时他又非常善于与人交际，这些因素促使其频繁地参与到外事活动中去。在这些活动中，他可以接触到国内政府要员、外交界人士，以及外籍外交人士。

8. 参加与社会名人相关的红白喜事及寿辰活动：“市商会等各团体联合开会，庆祝虞洽卿先生七秩寿辰。来宾题名、来宾签后各赠以王一亭书、段棋瑞书之折扇一把，以留纪念。计到有蒋院长（陈立夫代）、宋汉章、孙科（吴念代）、朱子桥、贝淞荪、吴开先、陈立夫、徐新六、沈田萃、黄金荣、荣宗敬、徐永柞、秦润卿、邵宾兴、汪伯奇、郭顺、何德奎、傅筱庵、吴茀、金润摩、谢葆生、张啸林、刘鸿生、田丰千代、代喜纯孝、前井二三、岩屋三男、卜部贞江，及日本代理总领与英法比俄等外宾。共计七百余人”。徐新六无疑是他生活时期上海的社会名人之一，而社会名人间的红白喜事及寿辰活动，则是他们具体交往的细节之一。与徐新六同去的人士大多数都是当时国内各界响当当的人士，也包括外籍在华政要等等。

9. 教育相关问题会议及活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于昨日上午十时举行第十二届毕业典礼，到吴市长代表教育局长潘公展、教育部长代表萧友梅、市党部代表曹沛滋、校董叶恭绰、袁履登、徐新六、褚民谊、钱永铭，来宾曾今可、李用中，及该校全体师生五百余人”。徐新六一生极其重视教育事业，他曾提议在公共租界内重视教育，此外他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会员，他也是多个学校的校董，曾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校董（一度兼任校长）。在参加这些活动中，它可以接触到民国的政府政要，同时也可以接触到活跃在教育领域的人士。

10. 国际问题相关会议：“国际问题研究会昨午假座静安寺路国际饭店举行第五十九次理事会，并以外交部长张群因公不在沪，特邀请参加交换意见。计到会者除张部长外，有理事郭秉文、钱新之、徐新六、刘湛恩、黎照寰、董显光、曹云祥、何德奎等。由理事郭秉文主席、执行干事戴葆夔报告上月工作情形……”徐新六除了参加官方派遣的外事活动外，他也会与一些民间关心外交事务的人士组织半官方性质的会议讨论国际格局中涉及中国的问题，也会参加国际性的民间外交会议，太平洋会议就是如此参与这些会议的人士都是一些领域内的精英，此外，也有政府内的外事人员参加，是对国家政治格外关心的一群人。

11. 上海市地方协会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议：“上海市地方协会于昨日下午三时在会所召集紧急会议。到会者杜月笙、钱新之、王晓籁、穆藕初、金侣琴、徐朵垂、冯炳南、潘仰尧、邹秉文、郭秉文、陈光甫、徐新六、刘鸿生、秦润卿、王伯元、林康侯、吴蕴斋、罗又玄、杨卫玉、黄任之等。由杜月笙主席讨论时局问题，历时甚久”。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上海市地方协会是一个相同组织的先后名称，是上海各个领域内精英组织的民间协会，最初的领袖是史量才，史被暗杀后由副会长杜月笙接任。这一组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并不能完全独立，史量才的被暗杀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它在一些上海地方事务中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徐新六是委员会中的委员之一，在这当中接触到的都是当时上海各领域内影响力颇大的人士。

12. 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第四期航空奖券开奖，各界往场监视者计上海市长暨警备司令吴铁城代表罗淬辉、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常务委员王延松、上海银行公会陈光甫、林康侯、财政部高等顾问张寿墉、委员虞洽卿、钱新之、徐新六、赘延芳、刘鸿生、斯比利门、普霖、富麦加利、米昌尔、第二特区法院励平、办事处长郑莱、秘书黄国恩、江浙皖赣鄂川六省总经理大运公司经理金廷荪等，暨中外来宾千余人”。徐新六在政府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中，被邀请作为监事人，和他一起的人也都是些当时在上海德高望重的人，从这些活动中，可以显示出徐新六在当时上海的影响力。

13. 政府官员个人举办的宴请活动：“孔部长昨招待金融界茶会，于救济市面后进一步谋复繁荣，惟仅交换意见，未有具体之决定，计到宋子文、徐新六、陈蔗青、叶琢堂、张啸林、秦润卿、杜月笙、张寿铺、虞洽卿、张公权、林康侯、唐寿民、许晓初、骆清华、王儒堂、陈行、顾季高、徐可亨、傅汝霖、沈田萃、傅筱庵、席德愈、胡笔江、冯耿江、贝淞荪、乌卜志豪、叶扶霄、王延松，及西人 D. H. Myei, J. E. Baker 等。共凡三百余人”。国民政府要员与上海地方官员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会举行一些私人性的宴会。徐新六是这类活动的常客。被宴请的人士是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和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身份尊贵外宾。徐新六受邀参加这种活动是身份地位被认可的一种体现。

14. 助人救济活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于昨日下午二时举行委员会议，到杜月笙、吴蕴斋、秦润卿、骆清华、宋汉章、贝淞荪、徐寄扇、王延松、徐新六、裴云卿、葛杰巨、严愕声、王志萃、蔡承新、汪伯奇、穆藕初、褚慧僧等五十余人，杜月笙主席”。徐新六参加了很多因战事或者灾难引起的相关助人救济活动。一方面，他的身份地位使他不得不参与进去；同时，也是他的同情心使然。参与活动的人士囊括上海各界，也有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参与进去。徐新六在参与的同时，也是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15. 股东大会及实业活动：“上海绸业银行股东临时会纪：计到股东陈藹士、冯仲、裴云卿、叶荫三、诸文绮、沈济思、吕葆光、鲁正炳、马少荃、葛叔谦、沈琴齐、王伯该、何五良、蔡声白、郑泽南、徐新六、俞佐庭、孙鹤口、傅瑞禾、许声扬、陈庆兆、陈子明、吴蕴初、曹子钮、刘展安等二百九十余入”。徐新六除了担任浙兴银行的总经理之外，他又是不少银行和公司的股东，同时他也以银行名义出资资助一些实业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与金融相关产业的不少人士的接触产生可能，同时也与实业家有所交集。

16. 蒋汪的接见与问询活动：“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于（一）和平、（二）外交、（三）建设各项问题意见起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请本市各界领袖赴京，闻被邀者计有商界王晓籁、虞洽卿，银行界李馥荪、徐新六，教育界刘湛恩、欧元怀，报界史量才、汪伯奇等，共计二十人”。徐新六一生中数次参加蒋介石和汪精卫这国民党两大政治人物组织精英人士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与谈话。与他同去的人都是被相中的各领域的人才。这也是徐新六才能被国民政府认可的一种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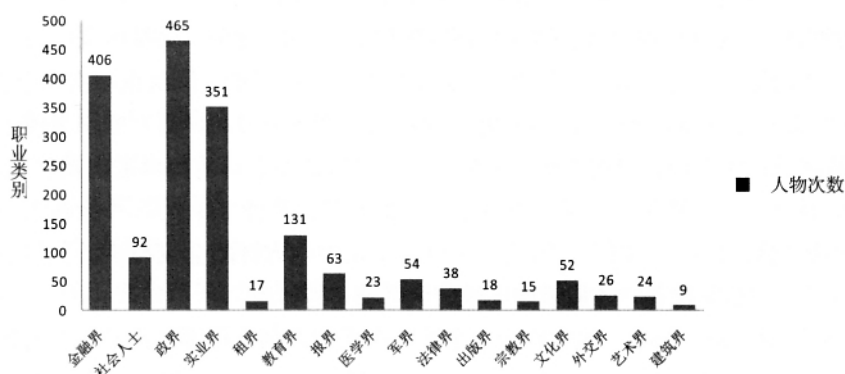
上述 16 类活动涵盖了国家、地方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活动包含有政治、经济、外交与教育等内容；地方社会层面则包容了地方的政事、商业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个人层面主要体现在他的私人活动空间，参加各种应酬往来，以及个人的职业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徐新六大部分都是作为受邀者，这一方面显示出徐新六在当时上海地方社会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也并非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人，只是在个人活动中是主角，例如他作为董事长的泰山保险公司股东大会。在徐新六参与的国家层面活动中，与徐新六共同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各个领域之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中央政府各个领域的高官要员，当中也不乏外国的政要和外事人员；而在地方社会的活动中，徐新六本身就是上海的地方精英人士，从一起参与者的知名度也可以看出徐新六与他们都是当时上海地方社会的佼佼者和活跃者，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二、徐新六的人际网络圈层

徐新六是上海的银行家，自 13 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至其留学前后，几乎一直都在上海生活。他任职的浙江兴业银行总部也位于上海，他社交的主要区域就在上海，他的家族背景和学历背景，促成了他在上海的知识界、金融界、实业界的穿越，并且游刃有余。而在知识界、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交往圈也多有交集，这样的交往圈层和交集也显示民国时期各界精英人际日常交往的样貌。

笔者根据上海档案馆馆藏徐新六的来往书信，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书信与日记，并统计梳理了 1917-1938 年间《申报》上刊载的徐新六参加的各类活动，以及与他一起参加活动的人员姓名，基本建构起徐新六周围的交往圈层。他的社交对象主要分布在政界、金融界、艺术界、医学界、知识界、外交界、实业界、军界、教育界、出版界、法律界、体育界等领域，而以知识界、金融界、教育界和实业界为主，其中相当多的人物与他有很深的交往。

图 2 人际网络职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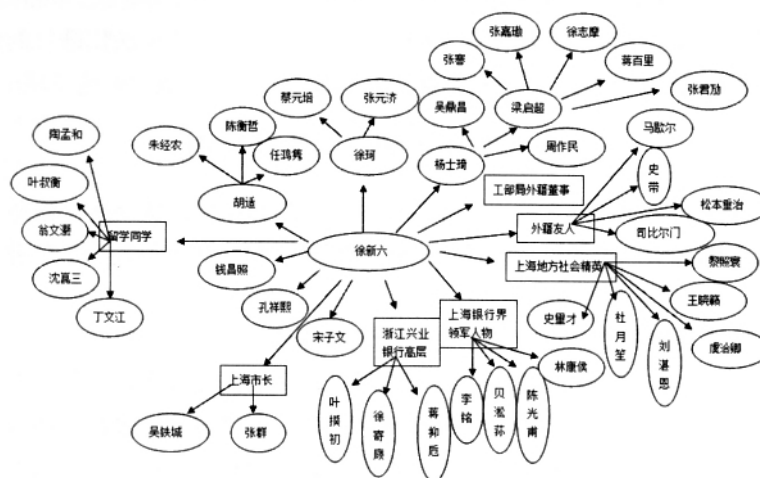


从对 1917-1938 年间《申报》的梳理统计，与徐新六共同出席活动的各界人士的排序是：金融界（406 人次）最多的是林康侯（262 次）；社会人士（92 人次）最多的是王晓籁（254 次）；政界人士（465 人次）中，偏金融业务的官员最多的是钱新之（214 次）；实业界（351 人次）最多的是刘鸿生（129 次）；上海地方社会中的政治官员最多的是吴铁城（111 次），租界（17 人次）内交集最多的是何德奎（76 次）；教育界（131 人次）最多的是刘湛恩（70 次）；南京国民政府中最多的是孔祥熙（62 次）；报界（63 人次）最多的是史量才（56 次）。军界（54 人次）最多的是杨虎（44 次），医学界（23 人次）最多的是颜福庆（39 次）；法律界（38 人次）最多的是江一平（37 次）；出版界（18 人次）最多的是王云五（31 次），宗教界（15 人次）最多的是屈文六（22 次）；文化界（52 人次）最多的是胡适（21 次）；外交界（26 人次）最多的是顾维钧（19 次）；艺术界（24 人次）最多的是梅兰芳（10 次）；建筑界（9 人次）都是 1 次。林康侯作为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委，徐新六与林康侯的交集场合大多数是在国家与上海地方社会中的金融相关活动中；王晓籁经营大量商业活动，是民国上海的闻人之一，徐新六与他接触的主要场合就是上海地方社会的种种事务中，在这些事务中，他们会共同被邀请参加；钱新之是四行储蓄会副主任与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徐新六与他接触主要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活动；刘鸿生的第一身份是实业家，此外他还短期担任过工部局的华董，徐新六与他接触的大多数场合是在上海地区金融相关的活动中；吴铁城作为上海市长，徐新六与他共同参加的活动大多数是吴铁城发起的公领域的或者私人活动；何德奎与徐新六有些类似，他们既在工部局内共事，也会一同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活动；刘湛恩作为沪江大学的校长，他与徐新六的交集一部分在教育领域的会议上，一部分就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务活动中；孔祥熙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他与徐新六的交集主要在国民政府中央的政治经济活动中，此外，还有孔祥熙私人性的宴请活动中；史量才作为《申报》总经理和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是上海地方精英的领军人物，徐新六与他的交集是在上海的地方性事务当中；杨虎先后任上海市保安处长和淞沪警备司令，是上海地方军事的主要人物，徐新六与他的交集主要在上海地方的政治活动中；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院长，是上海医学界的领军人物，徐新六与他主要是在上海地方社会事务中有所交集；江一平是民国律师，同时也当过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徐新六与他的交集大多是在工部局会议当中；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徐新六与他的交集主要是在上海社会的地方事务当中；屈文六是上海菩提学会的居士，在佛教界很有地位，徐新六与他的交集主要在地方社会救济救援活动中；胡适作为知名的大学者，与徐新六私交甚好，在公领域他们主要的交集就是涉及教育和外交的国际会议；顾维钧是著名的外交家，徐新六与他的交集主要在外事活动中；梅兰芳作为民国知名京剧艺术家，徐新六通过胡适与他相识，与他在《申报》中一同出现就是他每次来上海时，徐新六都出现在迎接的人士当中。而建筑界的人士则是徐新六在参加一次建筑界活动时的共同与会人员。

徐新六参加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家、地方社会与个人三个领域内，而以上选取的人士都是在这三方面活动中与徐新六交集颇多，并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徐新六只与以上各界人士中的一些人相识，有些人只是因为活动所需，出现在特定的活动和场合中。但是这些人物本身所代表的身份和职业领域是徐新六人际交往中交际人士职业地位构成的整体体现。由于他们参加同

一类型的活动，从侧面体现出徐新六交际的深度与广度。徐新六作为民国时期的银行家，他是有能力与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建立人际网络的，他的人际网络覆盖范围是既宽又广的。

图3 徐新六核心人际网络图



从图3中可以看出徐新六核心人际网络中的大致概况。箭头方向表示以徐新六为中心的人际网络形成的方向与过程，大致从家族和姻亲、留学群体、工部局和浙江兴业银行向外辐射。其中的人物身份多种多样，涉及到各行各业。主要人群分布在政界、金融界与实业界等。政界人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高官：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都任过行政院长与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前后两任上海市长张群和吴铁城、军事家蒋百里、教育家蔡元培，以及官商的代表张嘉猷和吴鼎昌等。此外，还有北洋政府时期为官的岳父杨士琦、好友丁文江等。金融界则有浙江兴业银行高层叶摇初、徐寄顾、蒋抑危；上海银行界领军人物李铭、贝淞荪、陈光甫、林康侯，以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国银行的高级职员叶叔衡等。实业界的张容、沈良三等。还有文化界的胡适、梁启超、陶孟和、张元济、朱经农、陈衡哲、任鸿隽、徐志摩与张君勱等。上海地方社会的精英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王晓籁、黎照寰与刘湛恩等。还有就是他工部局的同事以及外籍友人史带、马歇尔、司比尔门、松本重治等。而这些人中的徐珂、杨士琦、胡适与梁启超等人又是徐新六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通过他们，徐新六使自己的核心交际圈不断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上图网络结构只能显示徐新六人际网络的一般状态，而在徐新六的实际生活中，网络结构中出现的人物与徐新六的关系有远近、深浅、被动与主动等方面的不同。从现已出版的胡适日记和来往书信、《丁文江文集》（《徐志摩全集》《张元济全集》和《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等，徐新六日常生活中与学者和银行界人士的交往更多一些，吃饭、打牌的多为学者和银行界中人；与政界人士也多有交往，但从现有资料看，多为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动而进行的交流。例如徐新六与孔祥熙父子为《大陆报》经营有书信留下，这些书信的语气是极为客气的。徐新六同国民政府官员、公共租界工部局，还有通过外交活动而交往的国内外人士的交往，拓展了他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交际圈，但是他并没有从中获得很多利益，更多的是帮助政府或官员个人做事，在交际中他更多扮演付出的一方；当然这样的社交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也确保了他在民国政商两界的地位。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政治人脉在他进入浙江兴业银行管理层后发展银行业务时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他的银行因一些政治上的便利而获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并未因政治上的靠拢而有所得。他与外国人的交往更多是出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当然，他在工部局中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他结交的外国人士在他当工部局华董过程中出过力，与其合开保险公司的史带，在其死后将其子带赴美国，对其子关爱有加，这些都是他外籍交际中的获益。总体上看，他与政界和外籍人士的交往使他完全脱离不了政治，但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即便是同为学者圈、政界和金融界中的人物，与徐新六的关系也有差别，如徐新六与胡适、丁文江的往来要比与张元济等人多得多。《翁文灏日记》从1936年至徐新六意外死亡，翁每次因公到上海，都会找徐新六，徐到南京也会找翁。显然徐与翁的关系要比孔祥熙近得多。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在网络结构中呈现出来的。

受限于资料，也使网络结构图未必能完全显示出徐新六关系网络的亲疏关系。书信和报刊记载作为单个证据时，是有其缺陷的，而且不是所有的书信和报刊可以形成证据链，尤其是报

刊记载，更多的是显示出徐新六与一些人的交集，并不能体现交往的深浅和交往中的被动或主动性。例如在徐新六参加的活动中，基本都是各界人士共同参加，互相捧场。正如前文所述，《申报》中记述过虞洽卿的寿辰活动。参加的人中有陈立夫等高官、贝淞荪等金融界大佬、黄金荣等海上闻人、刘鸿生等实业家、《新闻报》经理汪伯奇、工部局的华委郭顺、何德奎等、军界的上海公安局副督察长谢葆生，以及英法比俄日的外宾。徐新六参加过不少这样的活动，与上述人物在不同场合会有交集，但具体的关系却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

三、人际关系资源与网络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无外乎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这些要素。徐新六形成和建构广泛人际网络自然也不例外。他最初的重要资源有两个：一是家世渊源与姻亲关系，二是进入职场就与梁启超和胡适结缘。

徐新六是清末民初文人徐珂的独子，上溯至高祖便是因科考入仕之家，家学源远流长，对徐新六有着很深的影响。其妻也是当时的官宦之后，姻亲网络大而显赫，亲属们分布在各行各业，在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与他有着频繁交集，彼此之间互有需求。武林江浒徐氏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科考而入仕的官宦之家，从祖上至徐新六一代，多为官员，虽然级别都不算较高，但其祖上为官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徐新六父亲好友夏敬观为其父徐珂（1869-1928）所写的墓志铭中写到：“曾祖应夔，中书科中书，祖孝酉，布政司理问”。他的祖父为徐恩绥（1831—1894）也为官员，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徐新六在其所辑的《复盒觅句图题咏》中收录了汤宝荣所写的《内阁中书余姚县教谕徐公行状》一文，其中有徐恩绥的小传：“公姓徐氏，讳恩绥，字印香，一字杏香，复盒其号也，清浙江钱塘人。同治癸酉举人，官内阁中书，终余姚县教谕，授征仕郎，封中议大夫。……著有《自立斋诗》《文》各一卷”。其父徐珂，初字仲玉，改字仲可，一作中可。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袁世凯于天津小站练兵时，作为袁的幕僚，为将校讲授经史大义。1901年，移居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为《辞源》编辑。同时，亦为南社社员。与蔡元培亦师亦友，又与况周颐、夏敬观等人相交好。晚年虽然不富裕，仍然著述颇丰。他是谭献的人室弟子，深于词学，在晚清中词风自有特色。近人钱仲联称其词“笔意澹宕疏快，不同于时人之好为艰涩者”。诗多写景，著有《真如室诗》《纯飞馆词》《小自立斋文》；词学著述有《近词丛话》《清代词学概论》《清词选集评》《历代词选集评》；另有《清稗类钞》四和又卷、《大受堂才己》五卷、《可言》十四卷及《晚清祸乱稗史》等。

据徐氏家谱记载，徐新六“娶杨氏，安徽涇县人……湖南监理财政官士隐次女”。而杨士绝五兄杨士琦膝下无女，徐新六妻杨氏过继给杨士琦为女。所以徐新六名义上的岳父是清末官员杨士琦。明清时期，杨氏家族在江淮地区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名门大家。杨氏在安徽的涇县和安庆影响较大。涇县的杨氏家族即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家族之一。当时的宗主为杨鸿弼，他有八子，徐新六岳父杨士恩为最小的老八，杨士琦为老五。其中前五子均有清朝功名，分别为杨士燮、杨士最、杨士骧、杨士琦、杨士铨。其中杨士晨、杨士燮、杨士骧均为光绪朝进士。而杨士琦与杨士铨则为光绪朝举人。杨士晨官至苏州关监督；杨士燮先后任过工部员外郎、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官和兵部给事中；杨士骧历任直隶通永道、直隶按察使和江西布政使等职。徐新六岳父杨士琦，字杏城。分别做过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谋士，是袁世凯重要智囊之一，在袁世凯一生很多大的政治活动中，杨都充当过主谋的角色。官职最高做到农工商部侍郎，袁世凯政府时为参议院参政。其实际的岳父杨士恩除了家谱中提及的湖南监理财政官之外，还在1913-1917年和1922-1924年间先后两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此外，士字辈下的毓字辈也人才辈出。杨毓莹，1913-1918年间北洋政府驻纽约总领事；杨毓玲，任过北京政府时期参谋部次长、陆军署次长与军政署署长；杨毓攢，1927-1928年间为北洋政府国务院印铸局长。杨毓攢为徐新六的妻兄，徐珂曾专门写文章称赞他才华横溢，称其为人“儒雅能文，且工八法”，“才藻俊茂，动学媚古，贵游子弟中所仅见”。此外，徐珂在《无园自慰》一文中提到，杨士琦“尝语新六，愿假我销夏”。杨士琦在西湖有一别墅，邀徐珂前去共度假期。这也是徐新六与杨氏家族交往的一个细节。

通过徐氏家族与杨氏家族背景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新六姻亲杨氏家族的背景更加显赫，多为政府高官。徐新六通过这一层关系，得以结识许多晚清和民国早期政界的人士，这对他在浙江兴业银行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起到过不小的作用。在北洋政府时期，徐新六因为与政府人士相熟，在银行业务上得到很多照顾，使银行获益不少，这当然与其姻亲家族的关系分不开。当时浙江兴业银行的大佬们之所以相中徐新六也是因为其岳丈这层关系。“丈人峰雄于资财，筹集资金，拉拢存款，亦非难事”。此外，徐新六通过他的岳父还得以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许多官员。人脉网络扩大而形成的网络使其受益，徐新六正是通过其岳父杨士琦与“北四行”

的周作民相识。

周作民（1884-1955年），1935年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指挥金城银行各地分行业务，在民国银行界地位显赫。“徐在京既有杨老提携，国家银行如中国、交通主持人冯幼伟、张公权、张季直、钱永铭等，‘北四行’周作民、吴达珍、谈荔孙等，亦通声气……可见其在当时为全国大老推重的一斑”。这是民国时期银行界人士潘仰尧于1963年写的《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一文中的回忆。从中可知。徐新六通过结识当时的银行界重要人士而在银行界内站稳脚跟。徐新六与周作民在民国时期有许多银行界的往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新六和李铭（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与周作民等受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指派，负责维持当时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38年3月24日，徐新六致信李铭转述孔祥熙的意旨：

馥荪吾兄台鉴：

兹附奉广州中央银行转来财政部本月文日快邮代电，第四一三号来函一件请台阅。阅后并希转送周、秦。

信中的“周”即为周作民。徐新六也与周作民一共对民族实业进行支持。例如（《申报》上刊载关于时金融界计划设立硫酸亚制造厂的文章：“刻闻我国化学工业家范旭东，本市金融界张公权、周作民、陈光甫、徐新六等鉴于设厂自制人造肥料之刻不容缓……”。此外，抗日战争爆发后，松本重治本人作为“和平派”，并不想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援引了日本外交人员船津辰一郎1937年8月12日的日记。日记中提到，船津辰一郎为了避免中日战争的扩大化，奔走于“周作民、徐新六、钱永铭、杜月笙等人间”。并最后与以上几人在周作民家里商议，希望他们能够对国民政府产生影响。

徐新六1921年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1925年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直至其1938年不幸身亡。他是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猷，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大陆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抑危等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江浙财阀”中的一员，同时，他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委员之一。他还是上海银行学会主席，兼任交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社会心理学讲社会和个人背景的相似性是产生人际关系吸引的原因之一。这些银行界人士从事相同的职业，银行家的地位与收入也都相仿，有些人也曾出国留学，归来后就进入银行界上层等等。徐新六生前广泛参与银行界的活动，频繁与银行界人士接触，所以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士在他人际交往中占了很大比重。他与周作民的交往是他与金融界交往的一个缩影。

在民国时期从事银行业，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挂钩。徐新六留学回国后，通过他岳父的关系于1917年任财政部秘书，步入仕途，其岳父又是北洋政府早期重要人物，两方面的因素使他可以相识不少政界人士。虽然他本身对政治不是很热衷，走上经济救国之路，从事经济行业，但是他并没有远离政治，而是一直身在其中。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他频繁地参加了政府发起的活动。并与其中的一些政界人士涉及经济业务和政治活动上的往来，与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着很深的交集。上文提到他在战时是负责上海经济运转的重要银行家之一，这无疑就是在承担着政府经济官员的职责，而他与孔祥熙因在《大陆报》经营上，往来很是紧密，通过以下这封书信可以一探究竟。徐新六1938年2月16日回复孔祥熙致信徐新六命其照顾上海经济与《大陆报》的信内容为：

庸公院长政座：

建侯兄自港返沪，承其交下钧函，敬审为国宣勤，勋猷卓茂，全民利赖，钦仰莫名。沪上市面，仰仗嘉猷，堪称安定。新六毫无贡献，备荷奖饰，既感且愧。嗣后关于金融事项，如有所见，自当遵示追随馥荪、建侯诸兄共同商讨，以为今笼之献。新之、光甫、寿民诸兄回沪，业已晤谈一切。大陆报务，重承尊囑，聊尽绵薄，辱蒙耻及，惭感莫名。以后对内对外遇有重要实务，仍当尽力协助，以纾厦注。肃此。敬颂勋祺。

徐新六在回信中语气极为谦虚，无论谈及何事，都不论及自己的功劳，夸赞他人，隐藏自己，“抑己扬人”，充分做到了“克己”。他采取“中庸”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有着极好“人缘”的因素之一。从其死后，各方人士都称其人品极佳，为人如何优秀等等就可以得知他被时人看作常人很难做到的“中庸”的典型。徐新六作为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对于国民政府经济有一定的影响，曾任国民政府高官的钱昌照回忆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时有好多建议都是出自徐新六。他也同政界人士保持着不错的关系。钱昌照在晚年回忆中

提到他每次到上海，徐新六“晚上总是来看我，无所不谈”。并说徐新六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上文提到的松本重治在回忆录中说到，为了避免中日战争的扩大化频繁奔走于徐新六、杜月笙等人之间。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徐新六与社会名流有着很多交集。徐新六生前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外，有好多是民间自发的。在上海发生庆祝活动或者灾难时，他们各界就会聚拢在一起，组成各种组织，徐新六基本都身在其中。徐新六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地方协会理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时在上海地区重要的民间组织的委员。通过参加这些组织，他得以与当时上海民间各界头面人物接触，这其中当然包括杜月笙、王晓籁、林康侯、虞洽卿与王一亭等海上闻人。这也可以满足他被人尊重，实现自我的需要。笔者通过杜月笙这一个典型例子来叙述徐新六与上海社会名流的交往。《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一文中指出杜月笙主动结交上海的银行界巨擘，以此来经营银行业务。而银行家结交了杜月笙，在上海就多了一把“保护伞”。徐新六与杜月笙之间，结交开始时应该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人之间的友谊是逐渐建立起来的。章君毅曾在《杜月笙传》中说过：“甚至可以这么说，杜月笙是徐新六的生平唯一知己”。

徐新六除了银行家的本职工作外还兼职无数，在这些兼职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无疑分量最重的一个。因为徐新六有留学外国的背景，又有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这块“招牌”，与“英国商会会长马歇尔、法商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司比尔门、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史带”等都有交往，这些人在其选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都给予过帮助。结识这些在上海滩有着重大话语权的外国人，绝对有助于徐新六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也使徐新六得以跻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在而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民国政府的官员还是上海市地方官员在处理外事方面，徐新六都是必请的座上宾。除了金融界与华董的兼职，徐新六还兼任过《时事新报》《大陆报》、申报电讯社董事长等职位，这些职位与他投资实业的主张有一定关系，但个别职业的获取与人际网络有着一定联系。例如上文提到的其在《大陆报》所任的副董事长一职，就是因为其与孔祥熙的交往有关。另外，1936年，宋子文聘任其为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一方面与其自身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徐新六与宋子文交好。徐新六与宋子文之间直接交往的材料笔者无法寻到，但是从他为主席的上海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募款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其与宋子文有着交情。该会委员陈翰笙后来回忆：“徐新六主席自告奋勇地去与政府高级官员商谈筹措资金的问题”，高官就是指宋子文与子L祥熙等人。徐新六也曾曾在胡适的帮助下，于1932年进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董事及名誉会计。他能得到这些职位，他的人际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新六还在外交活动方面比较活跃。在1929-1938年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期间，扎实的专业才能和擅长英法两国语言的特长，足以使他具备了与外国人交往的能力，因此他在一些外交性质活动中颇具影响力。通过这些活动，他也结交了不少外交界人士，并与其中一些交情非浅。叶叔衡在回忆中不无夸张地说到“他在国际上的名声，比在本国人之间还要大”。

徐新六在知识界人脉关系的建立，除了家世背景的影响外，与他留学回国后踏进梁启超、胡适的交际圈不无关系。1917年，徐新六回国后任财政部秘书，时梁启超为财政总长，两人由此相识。1919年梁启超赴欧考察，徐新六随行，另外还有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勱、刘崇杰与杨维新五人。此行前徐新六与丁文江就认识，此行后又与蒋百里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梁启超所写《欧游心影录》中，对徐新六极为依赖，由于徐新六妻病重，梁不得不随徐新六一同提前回国，“此间通法文最得力者，莫如振飞，彼若先行，我辈实大不便”。在考察期间徐新六陪同梁启超一起游览名胜、参加政治活动和拜访名人等，如1919年7月7日梁启超偕蒋百里、夏元慊与徐新六访问柏格森。另外梁启超在日记中曾写到“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勱、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三人在搜集材料时必定会有自己的取舍，梁的行文内容会受到以上三人的影响。张君勱为政治哲学界的名人，徐新六归国后广泛参与了诸多政治活动；此外，徐新六与张嘉傲交好，张君勱作为张嘉傲的二哥，徐新六在生活中应该会与张君勱有着一定的交集。

吴炳守曾发文写到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归国后，倡导文化运动，形成“研究系知识分子”（即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团体）。徐新六即为其中一员。吴提到时任“浙兴”协理的徐新六被聘为中国公学的教员，另外还有霍季刚（憋业银行副总裁）、胡孟嘉（交通银行副经理）、潘学案（友邦保险公司经理）、杨端六（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徐广德（会计师）等，这些人都与时在上海银行界有很大影响力的张嘉傲有关。另外梁成立了共学社，作为纯粹民间学术机构，徐新六等在其中作为评议员从事翻译事业。梁还依靠徐新六、张赛、张嘉傲的帮助，想要成立中比贸易公司与中比轮船公司以发展经济，但未能成功。1920年4月23日，徐新六致梁启超书，报告中比公司招股情形：

任公年丈踢鉴：

傅佩青兄自京归，借悉日来兴居一斑，西山游乞已定，百里拟于旬后南归。中比事股款事已有着落，惟比国回电迟迟未到，殊为着急，黎黄陂、张乾若、陈任先、江竞盒、魏组东诸公均有入股之意，大约均悉张、魏所招集：许君熊章来询，六当语以股款已认齐，惟此诸公自所欢迎，容与上海接洽云云，拟与公权妥商后，再复之也。二许君稍过赴津，云拟晋谒钧座也。仰光林君说明书草就奉上，如能即寄周夫人转交，得认股款，我辈声气较壮。唐天如处六已有函往突。

1920年5月28日刘垣致梁启超的信中告知徐新六已经去了即将开的“华股创办人谈话会”。1920年徐新六致梁启超信，首先谈到读书俱乐部“推仲策、在君为干事”。主要内容谈增股事，并告知已经通过书信告诉了厚生（刘垣），并与公权妥商办法。另说“溯初日前曾见之，仍略血。惟较前已轻，医者劝以静养少思多默，百里与新六大约旬后均有沪行，敬扣曼福”。

从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梁启超他们筹备建立中比公司的一些细节，信中所提及的“公权”即张嘉猷，“百里”即蒋百里，刘垣，字厚生，其此时在张春所创办公司任职，他们在为此事进行商议筹办。从信中“我辈声气较壮”等话的语气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徐新六与梁启超他们对建立中比公司的情志昂扬，“比国回电迟迟未到，殊为着急”。也能看出他们希望能办成公司的急切心情。“溯初”即近代实业家、教育家黄溯初，黄与梁启超留学日本相识，其赞成戊戌变法。通过以上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徐新六应该是通过梁启超得以认识黄溯初，扩展了人脉。黄与徐新六在筹备中比公司过程中接触应该较多，张君勱在致黄的信《张君勱与黄溯初书》中曾劝他与张嘉猷、徐新六等共同为此出力。蔡元培曾在1920年7月6日晚日记中记到其与黄溯初、张君勱等人共同“应叶景葵、徐新六之招赴宴”。而后的岁月中他们又曾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如1932年5月26日，他们与张嘉猷、吴鼎昌等人共同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等。

徐新六在梁启超号召的经济活动中出力，通过这个圈子，他得以熟识更多的人，也与蒋百里等人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在梁启超组织的一些文化政治活动中也都有徐新六的身影。1920年4月17日蒋百里致胡适的信中提到：“昨接振飞电，深知菊生于商务印书馆总理决意辞退，现在已准备交代云。菊生果能别树一帜，岂不大妙”。文中提到的“菊生”即张元济，那时徐新六与蒋百里在一起为梁启超做事，往来很是频繁，互通信息，交流意见等等。但是目前保留下来的材料并不是很多。蒋百里与徐新六的亲密交往延续到他们逝世时期（两人均于1938年去世）。1931年10月23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提到，他想买蒋百里的一件东西，怀疑旁人在胡乱抬价，致使蒋百里不想以之前商定好的三万两千元出卖。蒋百里想要去找徐新六估值，徐志摩建议陆小曼“何妨请少蝶去见振飞，将经过情形说个明白。振飞的话，百里当然相信”。徐志摩作为梁启超的弟子，与蒋百里、徐新六交往实属正常。从徐志摩的语气中我们也可得知徐新六与蒋百里彼此的关系非同一般。

1920年7月2日，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提到他们要发行的《改造》第一期杂志“已与振飞、叔衡、志先等商”，拟用新文化运动为主题。1920年7月24日，梁启超《致伯强、亮挤、溯初、志先诸兄书》一信中，提到：“振飞在此淹滞数日，今晨返京，弟以为宜今时发起一国民制宪同志会，各情由振飞面详，若诸公慰然，请商进行次第。车通后，详、亮两兄能一来商，尤妙”。1920年7月30日，蒋百里致梁启超书信，讨论《改造》杂志中的文章事情，“振飞归晤，得悉一切。国民制宪的文章，大可发表，事实进行，此间拟有一方法较妥，应间振飞转陈”。蒋百里信中的“叔衡”即叶叔衡，是徐新六日后就职的“浙兴银行”的董事长叶景葵的亲弟弟。梁启超信中的“志先”即蓝志先，“伯强”即梁善济，“亮挤”即籍忠寅，“溯初”即上文中的黄溯初，四人均属于梁启超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

徐新六通过梁启超认识的政界人士，在其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初期，对银行进行改革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徐新六此时以后辈身份随梁启超参与的一些社会活动，对其而后生命中热衷于社会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以梁启超为核心的这个圈子中的丁文江、蒋百里、徐志摩等人又与以胡适为主体的圈子有交集。

徐新六生前与胡适交往密切，十分要好。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证实。其一，余英时曾在一本书中提到胡适后期所收弟子之中比较亲近的罗尔纲在其《关于胡适的点滴》一文中有如下话语：“胡适夫妇与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最相好，连两家孩子也彼此相好”。其二，胡适在得知徐新六不幸身亡的消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国内友人，在君（即丁文江，笔者注）、新六最可敬爱，在君已死，新六何可再失”其三，据笔者统计，《胡

适日记全集）中，徐新六的名字在胡适日记中有 72 处。提及徐志摩的有 74 处。。徐志摩在文化界内，是徐新六公认的好朋友，胡适日记中，徐新六与徐志摩均因飞机失事而早亡，并且他们的年龄与和胡适相识时间都相差不多，因此两者之间的对比有一定的说服力。胡适把徐新六、丁文江与徐志摩看成是他一生中交的很要好的三个朋友，徐新六与丁徐两人交情也相当深厚，这点不再详述。胡适 1938 年 8 月 27 日在得知新六的确死了后，在写给江冬秀（胡适妻）信中写道：

我这三天（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真不好过。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寂寂寞。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最相投，不料这两个最可爱的朋友偏偏最先死了！我昨天写一信给徐太太由铁如转托鑫生转交。你见她时，请代我慰问她一家。徐老太太还康健吗？真可怜！真可惜！我自己的事，至今还没有定妥。将来是怎么样没我全不知道。新六最后一次写信（六月七日）给我，说：“此时能尽此一分力，尽此一日力而已。”我现在也只能作此想，以报答国家，报答朋友。

两人交往必定会有一个相识到相交的过程。据季维龙考证，徐新六与胡适相识于 1918 年秋天，由陶孟和介绍二人彼此认识。时陶孟和、徐新六同胡适均在北京大学任教，陶胡两人同时又都是《新青年》的编委。而陶孟和是徐新六去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归国后同在北京任职，交往颇多，在而后的岁月里也联系甚密。胡适 1918 年 11 月 22 日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到请徐新六介绍其与梁启超认识，“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徐新六于 11 月 7 日致梁启超信中写到：‘·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敢晋一言，已当介绍’。由此，胡适会在梁启超与徐新六的交际圈中与一些人相识，而后成为很好的朋友，丁文江也是由徐新六介绍与胡适相识。

徐新六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 1920 年 4 月 21 日，内容为：“东方饭店，振飞邀会陈光普。”笔者认同陈漱渝先生的看法，陈光普为笔误，应为陈光甫。胡适与徐新六于 1921 年 7 月 15 日相遇在其离开北京去上海的火车上。在火车上进行聊天，“谈的甚畅快”。谈话的内容为：“谈英国及大陆现状，甚有味，他谈及蔡子民先生在法国受苦”；而后又谈论美国新出版的很受欢迎的一本小说。二人均有留学欧美大陆的背景，聊国外的话题，很容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彼时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的马寅初曾设宴款待到达上海后的胡适。1921 年 8 月 15 日，胡适回访马寅初，又碰到了刚出任“浙兴”总办事处书记长的徐新六。胡适在当日日记中写了徐新六向他讲了当时北京政府发行了为期十年的 3000 万公债，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以 6.8 折从政府购得，然后以 8 折出售。。通过以上这些记述可以看出，此时二人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后来那么好的地步。胡适 1923 年 6 月 3 日的日记中记到：“回寓所，徐新六已先在我室中坐待。我们谈了很久，得杏佛电话，邀我到一品香谈话，我同新六走出，走了一里多路，始坐车”。。随着胡适逗留上海时间的延长，徐新六与其交往的机会也会更多，从这个日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已经是相当的好。信中提到的“杏佛”即后来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

1922 年 5 月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是胡适留学归国后“谈政治”的开端，也是以胡适为核心的一批学人议政的平台。1923 年 10 月 21 日，该报因经费、人手、出版机关等问题被迫停刊。《努力周报》的骨干成员共有 16 人：胡适、丁文江、张慰慈（哲学博士，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高一涵（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陶孟和、任鸿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陈衡哲（女学者、作家、诗人）、朱经农（教育家、学者）、徐新六、沈性仁（时任北大教授、陶孟和妻）、蒋梦麟（时任北大教育系教授）、蔡元培（时任北大校长）、王云五（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微（胡适留学同学，时任北大教授）、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a 此时徐新六与胡适关系已经很密切，可以看到，在以胡适为中】合的活动中，总少不了徐新六的身影。以上的一些人中有 n 人任职北大，徐新六曾经任职于北大（时徐新六已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基本上都是徐新六的老相识，徐与个别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例如丁文江、陶孟和与胡适等。通过这种活动，加深了徐新六与老朋友的感情，同时又能扩展更广阔的交际面。1929 年 5 月 19 日胡适所组织的平社在范园聚餐。他们预计每人就“中国问题”发表一篇论文，徐新六是“从财政上”写一篇文章，发表日期初步预计为“七月十三日”。“平社”主要是在“新月书店”成员与《新月》月刊的同人的基础上又加了几个胡适的知识分子朋友而组成的，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称之为“中国问题”。“平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团，而是被沈卫威称为是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同《努力周报》一样，在“平社”中，徐新六并不是骨干力量，有些人他在进入该组织之前就已经熟识，进入后又增添了几个朋友。在“平社”存在期间，徐新六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一定的往来，此时的徐新六正处在自己事业的上升期，“浙兴”的总经理、工部局华董，可谓是年轻有为，相识更多的人，使其在各个层面上的工作都更加顺畅。

徐新六在胡适的帮助下，于1932年进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董事及名誉会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徐新六任职期间的中国董事还有周治春（教育家，曾长期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丁文江、蔡元培、翁文灏、孙科（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伍廷芳之子，中华民国外交官、政治家、书法家）、李石曾（社会教育家、后任国民党官员）、任鸿隽、金绍基（时任北平美术学院副院长、北平博物学协会会长）、孙洪芬（“中基会”执行秘书、秘书长、干事长、董事）、叶良才（“中基会”会计）、林伯遵（“中基会”秘书）。还有孟禄、贝诺德、贝克等外籍董事。徐新六又得以认识一些人。以下是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徐新六在“中基会”共事的一些片段。1934年5月24日：“中基会请新六吃饭，我也在座”。1938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孙洪芬、叶良才、林伯遵，写信时胡适身在美国，告知他们“中基会”开会时如果投票，他的那一票“可请徐新六兄作我的代表”。翁文灏在1938年2月3日日记中记到，“徐新六来函，中华文基会拟于四月29—30两天在香港开会。函复拟到”。1938年4月24日，翁文灏飞抵香港，出席中基会董事会第14次年会。25日上午，“偕周怡春、徐新六、孙洪芬、任鸿隽等出访蔡元培”。从中可以看出，徐新六在“中基会”的活动中还是很有热情的。通过这些活动，其与一些朋友得到了更多交往的机会，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保持着往来。

参加胡适介绍的社会活动，徐新六得以认识很多不同方面的人。生活中，胡适组织一些聚会，参加者也都是胡适比较要好的朋友，随着徐新六参加次数的增多，与他们相熟识的机会就越多。1929年12月17日，胡适日记中记到：“今天是我满三十八岁的生日，约了梦旦先生、仲洽、新六、良三、实秋、西林、努生来吃便饭”。@“梦旦”即高梦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仲洽”是高梦旦的儿子。“实秋”即梁实秋；“西林”即丁西林；“努生”即罗隆基。沈良三，徐新六留欧时的同学，英美烟公司董事。沈曾在“五卅”运动后，其刚成为英美烟公司董事时，为了业绩原因，找到徐新六，用“浙兴”的名义购买该公司股票。胡适把他们找到一起，说明他们之间应该是彼此都算是相熟了。1934年除夕，胡适与“张仲述、余上玩、碗华、幼伟及新六”到国际大饭店吃饭。张仲述，即张彭春，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余上玩，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碗华”，即梅兰芳。“幼伟”，即冯耿光，梅兰芳一生最重要的支持者，“梅党”。在胡适日记中出现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的人徐新六在认识胡适之前已经相识，有些人是通过胡适才得以认识。因为胡适具有强大的个人凝聚力，徐新六得以与胡适朋友圈中的人更加频繁地接触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有些人在徐新六的生活和工作上对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胡适在他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和任董事的亚东图书馆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时也总是找徐新六予以帮助解决；胡适还经常托徐新六转送家信。似「」之间的交往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四、结语

徐新六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交际面覆盖了银行界、政界、实业界、知识界等领域。尤其与知识界和实业界一些人士的交往都达到一定的深度，有些成为一生的朋友。这些都使他在民国的上海社会具备相当的影响力。

徐新六的人际网络对他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良性的作用。北洋政府时期的浙江兴业银行是史上发展最好的阶段，其中相当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某种程度上的照顾。徐新六的姻亲泗县杨氏家族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员家族，由于这层关系，他在银行界内很好发展，潘仰尧在回忆中说当时浙兴的大佬们之所以相中徐新六也是因为其岳丈的这层关系。“丈人峰雄于资财，筹集资金，拉拢存款，亦非难事”。此外，徐新六通过他的岳父还得以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许多官员。而徐新六早年也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工作，作为梁启超的秘书，他为梁启超作了许多事情，这使他有可能会结识更多的政界、实业界、银行界中精英人士，这为他以后事业上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帮助作用，这一过程中结识的张嘉猷为他而后在上海银行界的发迹就是一例。而徐新六通过与胡适的交往，他得以认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其中包括很多“政学系”官员；徐新六因为与大量政府官员相熟，在银行业务上得到很多照顾，使银行获益不少。上文也提到他通过他的岳父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北四行”与“南三行”的负责人搭上非同一般的关系。此外，他的其他朋友在银行业务上对徐新六也多加照顾。

徐新六在银行界内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无论是对外，还是在他自己任职的银行内，人们对他都是十分认可的。银行界内有自己的银行同业公会，银行界内的这些精英既竞争，又互为依靠。为了应对美国1934年颁布的“白银法案”，李铭、陈光甫与徐新六等人秘密商谈，“欲在上海创立一家不动产抵押银行”，以此来吸收市面流动资金，盘活经济。他们这几位被称

作“江浙财阀”的巨头们，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经营的都是私营的银行，可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虽然银行家经营的银行之间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竞争，但他们仍需要共同面对风险，这种“抱团”的效应为徐新六在经营银行上减少了阻力。与“政学系”官员的结识对徐新六来说，也给他创造了机会。

徐新六的人际关系网络给他的银行事业带来好处，但他并未受制于这种传统的关系网络，这点与传统的金融业如山西票号就有很大的差别，票号是依靠传统的私人之间的信任来运作的，因此人为的因素在整个票号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任何经济交易都必须有信任才能达成，而信任的类型、性质又是和这个社会的社会传统、文化、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其信任也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特殊主义信任。在山西票号的金融运作机制中，其金融功能是“嵌入”在社会功能中的，它不能离开传统的人际关系发挥作用。每个票号在用人和业务上都是由若干个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组成，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按照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和“自我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也就是说传统票号的金融功能是依赖这种特殊人际关系而存在的。这既带来生意也带来致命伤。

一个金融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就看它的社会性功能还剩下多少，越是传统的社会，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越是分不开，而现代的银行制度则只有经济功能，完全没有社会功能。浙江兴业银行就是属于这样的现代金融企业，从清末开始，钱庄业就开始向银行业转化，浙江兴业银行于1907年成立的，它与传统的票号、钱庄有本质的不同，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基于对传统人格关系的克服，即银行的金融功能是不依赖于传统特殊人际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徐新六在浙江兴业银行任总经理，其实是新式职业经理人。徐新六作为职业经理人充分利用他的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浙江兴业银行这个现代企业服务，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浙江兴业银行的辉煌时代。。就这方面而言也算是近代中国企业利用传统人际网络关系发展自己的一个范例。

人际网络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也决定了他必然会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受到政治的羁绊。他与政府官员发生联系，并且帮助政府的代言人从事各类活动，同时也以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政府的一些决策。徐新六虽有丰富的财政、金融、经济方面的学识与经验，但当国民党政府拟委以财政部门的官职时总设法婉拒。徐新六与政治这种比较微妙的关系就如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样，虽然使他的银行和本人从中有所获益，但实际上金融界的这些人物在民国时期依然摆脱不了边缘帮衬的角色，有时还导致银行时常受到挤压，这实际上也是民国时期他所在的阶层不得不面对的情形。徐新六作为一位民国银行家，他的人生遭际和日常生活样态，他的人际网络中的圈层分类与交集向我们显示了民国社会中金融界精英人士的人际交往样貌。